

# 處處有同胞

小 冰



柳絮紛飛

這些年在國外旅行，時時聽到中國話，處處碰到中國人。中國話又分南腔北調，如果稍加留意，又從那些南腔北調之間分辨出北京話、上海話、東北話、四川話，甚至川東土話、川西土話。在日本北海道伊達時代村的大門外，碰到一個說京腔的北京團準備進大門；在札幌的一個餐廳吃飯，同桌的是一對蘭州小夫妻；在小樽的街頭拍照，一位來自香港大埔的女士幫我們拍合影，大埔，說起來和我們都是鄰居。

翻開史冊看看，退到二十年前的篇章，那時候世界遊客的主力軍是日本人。記得二十多年前在美國波士頓的一個早晨，一個洋人用日語對我們說「孔尼其瓦」（早晨好），我們用普通話的「早晨好」回應他，並告訴他我們是中國人，他聽了還感到驚訝。那時候，日本文化受追捧，世界各地不少景點都為日本人着想，日餐、日語路標、榻榻米睡房，連招聘服務員也要考慮是否會點日語，店老闆們都認為，只要日本人到來，就財源滾滾。

風水輪流轉，二十一世紀轉到了中國，世界上好玩好看的地方，主要由中國人撐起了。中國旅行社的出國旅行搞得紅紅火火，尤其是在節假日，如春節、「五一」勞動節、國慶節。在世界各國的旅遊景點，到處都有中國遊客的身影。許多旅遊從業人員從學日語改為學漢語，餐廳、商店、車站、酒店裏，漢語成為另一種通用語言。

在札幌市的一個商場裏，一位陌生女遊客問我：「你們是自由行吧？」她竟然說的是「川普」，四川人很幽默，把自己不太標準的普通話自嘲為四川普通話，簡稱「川普」。我直接用成都話告訴她：「是的，自由行，我們是一家人。」聽我說家鄉話，

她立馬親熱起來，輕鬆跟我攀談。之後她斜視一下她們的導遊，壓低嗓子對我說：「還是自由行安逸，不用去指定的購物點。」在眾多繁忙的超市裏，如果有一天幾次碰到說方言的老鄉，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說完話，女老鄉趕緊調頭，走向站在電飯鍋櫃枱旁的夥伴們。接待他們的店員是一位年輕人，他一個人應付一個團，雖然講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卻也招架不住。只見後生仔掏出手機打了一通電話，收起手機之時告訴我的同胞們：「另外兩個會說普通話的同事馬上到來。」

現實中，服務員不能不學漢語，但是中國遊客如果不會外語，卻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看過一個報道，一對不會講外語的中國夫婦出國旅行，從北美到南美，從亞洲到非洲，一路靠翻譯軟件和會說漢語的人幫忙，他們成功走遍世界。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The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指出：中國內地遊客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旅遊消費群體，超過美國、日本、德國。為了吸引中國遊客，各國旅遊部門煞費心機，韓國的婚慶公司設計了豪華的婚慶儀式，以吸引中國新婚夫婦前去旅行結婚；悉尼修建了中國主題公園，按照原有的尺寸仿製紫禁城大門；巴黎出版了普通話旅行用語手冊，鼓勵服務員學習普通話的同時，還要理解中國人的需求，理解他們「對食物的烹飪特點和對酒的挑剔」。

在札幌的那家餐廳裏，女服務員問我們菜餚的味道如何，我告訴她：「好吃。只是如果把麻婆豆腐做成香辣而不是乾辣，就完美了。」外子聽了覺得我的要求太過挑剔，就說：「在北海道，能把川菜做到這個水準，該知足了！再說，人家的服務也夠周到，狗殷勤的。」他轉向服務員，說：「不錯不錯！阿里嘎朵！」



文化什錦

一九八〇年十月，薩利姆結束在聯合國十餘年的任期回國，出任坦桑尼亞外交部長。兩年後的一九八三年一月，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訪問坦桑尼亞，我奉命前往參加新聞報道。在首都達累斯薩拉姆，我幾次在外交場合看到他，但沒有機會講話。

不過也巧，在訪問結束的那天下午，坦桑尼亞北部小城阿魯沙的梅羅山賓館人來人往，熙熙攘攘。我發現一位西裝革履的先生獨坐在大廳中一個僻靜的角落，把半導體收音機貼在耳朵上專注地收聽新聞廣播。轉換個角度望去，我發現那就是薩利姆外長。我悄然走上前去，待他聽到一個段落，遞上名片。

他瞄了一眼，立即站起身，爽朗地笑道：「啊，中國朋友，有什麼要幫忙的，請直言，不必客氣。」我知道時間有限，撇開追溯十多年前北京邂逅的衝動，單刀直入地向他提出兩個問題：一是他如何成為一位名揚天下的外交家，二是談一談他對中國的印象。

薩利姆很客氣地請我同他一起落座，首先回



HK人與事

當獲知鍾逸傑去世的消息，我仰望著遠方天空，似乎看見天邊一棵孤清老樹，最後的一片樹葉隨肅殺秋風飄落於地，然後戛然而止，他的一生就這麼定格了。

鍾逸傑（Sir David Akers-Jones）於一九五七年從英國來到香港，擔任過不少要職，包括新界政務司、布政司、署理港督等。新界這一片廣袤的土地，曾在他的手上發生巨大變化，所以他有「新市鎮之父」之稱。他與新界鄉紳有着千絲萬縷的情誼，諸如鄧乃文、陳日新、黎國耀、劉星發等等，他與新界鄉議局的交集更是不在話下，我在鄉議局檔案中可以看見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每個月都有與鍾逸傑開會的會議記錄。雖然他改變新界面貌，但在其中一份讓我黯然神傷，掩卷嘆息的會議記錄是，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的承諾，（這可以說是他對新界土地用途的改變當中，曾對原居民答應的承諾，結果並沒有兌現）的遺憾，而我也相信沒有兌現的承諾，不止這一件。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以後，很多人以為鍾逸傑回「國」了，但直到他離世前，仍然居住於香港。他說：「我對其他地方已經感到陌生了，因為香港有許多朋友，有許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如果我回到英國，可能就像中國唐詩所寫：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唐代詩人黃峭「年深異境猶舊境，日久他鄉即故鄉」，不就是今天鍾逸傑或任何一位離鄉遊子的寫照嗎？當我們跳脫了對故鄉的思念，最好的辦法就是立足當下，親愛自己腳下的土地與人民。鍾逸傑擔任新界政務官悠長的歲月裏，正是香港新界滄海桑田發



香江憶記

對於上一輩的香港人來說，都習慣將列車稱為「火車」，又將輪船稱為「火船」，今天年輕一代聽來，有點摸不着頭腦，明明是一列車或者一艘船，何以與火扯上關係？

原來，這種叫法是相當形象化的，主要原因是在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期，人們發明了可以產生動力的蒸汽機，並且將之應用在列車和輪船之上，而要產生蒸汽，就必須依靠燃燒木炭或煤塊去將水加熱至沸點，再將蒸汽收集以驅動渦輪旋轉，再驅動車輪或者輪船的螺旋槳。在這個驅動過程中，蒸汽需要連綿不斷地產生，意味着在列車或者輪船的行程中，燃燒過程都不能中斷，否則列車或輪船就會失去動力而無法前行。

正由於炭或煤在燃燒時都會出現火焰和高熱，人們於是很形象化地將蒸汽列車和蒸汽輪船稱為「火車」和「火船」。雖然時移世易，今日的列車已經進入電氣化年代，而輪船亦全部改用更具效率和更環保的內燃機，甚至使用低硫柴油，

# 情繫中國

高秋福

答第一個問題說：「我不是什麼外交家，只不過是一個以外交事務為職業的人。」他解釋說，他是一邊當大使，一邊當學生，半工半讀出身的外交官。如在印度任職時，事務雖然繁忙，他還是抽出時間上函授課，研讀國際政治和國際法，獲得學士學位。別看這個學位不高，卻完全是憑讀書、聽課和寫論文拿到的，而不像某些博士頭銜，是別人作為榮譽贈送的。聽着薩利姆這番話，他把收音機放在耳畔的鏡頭不禁又在我的眼前閃爍起來。珍惜時間，時刻不忘工作和學習，密切跟蹤世界形勢的發展，這也許就是外交家薩利姆的成功之道。

談到第二個問題，薩利姆興趣盎然。他說，他對中國好似有一種天然的情感。從中學開始，他就閱讀有關中國的書籍，從孔夫子到毛澤東，什麼書籍都如飢似渴地閱讀。當然，閱讀最多的還是毛澤東的著作和各種關於中國革命的書刊。他還曾將那些書刊中的一些文章轉發到他編輯的刊物上。這一切都是出於桑給巴爾爭取獨立鬥爭的需要。轉向外交工作之後，在埃及和印度，他結識不少中國駐外人員，親切地互稱「同志」。從他們那裏，他對中國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了解

。後來，出使中國來到北京，又「直接閱讀現實生活這本中國大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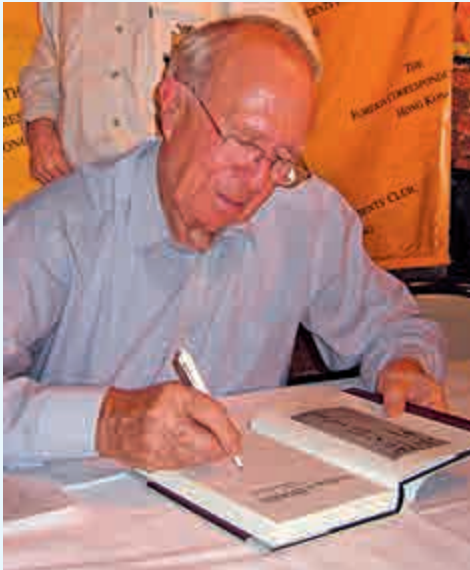
當時正是中國不平凡的年代。他對那時中國發生的事情，欣喜過，也困惑過。在中國為時不長，最大的收穫是加深了同中國「再也無法割捨的情感」。他一到中國，就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在那裏向毛澤東主席遞交國書。他視比自己年長四十四歲的周恩來總理為良師益友，多次晤面，親切交談，獲教良多。在聯合國工作期間，他同中國同志的交往更為密切，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看到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日益提高，預感到中國必將在世界事務中發揮出越來越大的影響力。

這次採訪後不久，薩利姆先後擔任坦桑尼亞政府總理兼執政的革命黨國防安全委員會書記和政府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任職期間，他注重同中國發展關係，兩國的經貿往來大大加強，坦贊鐵路的管理和使用得到改進，軍事和人文交流更加密切。他在接受我的一位同事採訪時說，每次訪華，總有回家一樣的感覺，中坦兩國的關係愈來愈親近。

（「中國『友誼勳章』榮譽者薩利姆」之三）

# 鍾逸傑的香港心

廖書蘭



▲香港前布政司鍾逸傑

資料圖片

生巨變的時期，掌管這個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包括兩百三十五個島嶼的政務。鍾逸傑怎麼看新界？

我以前拜訪鍾逸傑記得，他的家居布置呈現濃濃中英兩國傳統文化風格，有兩尊釋迦牟尼佛祖的石像與畫像，臨海窗前有一排蓮花，還有兩三幅他畫的油畫，油畫裏的風景應該是英格蘭的深秋吧？那深秋的黃葉是否埋藏着他心中如火如荼的心事。

當時他已是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喝着英國茶娓娓道來：「一八九八年，李鴻章和港督卜力簽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九十九年，由於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罷工，間接促成原來是『租借農工商業研究總會』的原居民團體，在一九二六年經金文泰改名『鄉議局』正式成立。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年，鄉議局的內部鬥爭嚴峻，面臨幾乎瓦解的命運，結果政府將鄉議局列為政府在新

界的法定諮詢機構，從此確立了鄉議局在新界的影響力。」他停歇了一會兒，繼續說：「新界政務司的工作是圍繞新界的土地政策、新界的土地管理，及如何將農村發展成新市鎮為目標。」

雖然，鍾逸傑認為丁屋政策已經與當年黎敦義（Denis Campbell Bray）制定時候的目的不同了。原意是保護村落的傳統文化，不讓其消失在歷史洪流中。而我認為原居民權益已被社會輿論誤導成了特權的概念，表面上，丁屋政策是原居民的特權而實質卻是港英政府以一塊牛排交換原居民的一頭牛，後又被發展商以偷梁換柱手法，轉移了利益。新界原居民可說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自己知。

據了解，鍾逸傑於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七年間任元朗理民官，一九七三年，鍾逸傑以新界民政署署長的身份加入立法局，擔任議員長達十四年之久。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改任新界政務司，與新界鄉紳建立了友好關係，在任期間加快了新界新市鎮的發展。

訪談結束時，他說，偶而仍會去元朗走走，和一班老朋友見見面。他建議我拜訪元朗的老鄉紳，發掘一些值得書寫的新界老故事。

我曾拜訪他數次，見他一次比一次衰老，憶及五個月前為了拙著《被忽略的主角》增修版請他賜序，感覺他像一枝蠟燭，那火焰是越來越弱了。最後他選在公立伊利沙伯醫院終老，養病期間面對來探望他的人，仍然關心詢問香港目前情況如何。

從他的一生可以看到離鄉背井沒有不好，老年生活形影單隻沒有不好，他為香港新界建設新市鎮，固然是好。走筆至此，我遙望窗外，那一棵天邊老樹，是否已在天上？是否會祝福香港這塊熱土？

# 火車名稱由來

過來人

但老一輩香港人仍然習慣使用「火車」和「火船」的詞彙。

由蒸汽發動機到今日的電氣化列車，過程當然並非一蹴而就，從一九六二年最後一個蒸汽車頭退出歷史舞台開始，本港有十多年時間由內燃機動力車頭擔當重任，這些機車儘管仍然存在缺點，包括加速度不夠快，運作過程中亦會排放大量污染物，但相對於蒸汽車頭來說，已經有了很大改善，例如續航能力大大提升，即使長途行車，也只需中途加油即可，令行車安排更靈活和更具彈性。

當年九廣鐵路直屬於港英政府，因此將鐵路進行電氣化改造不屬於一種商業行為，建築成本只要獲得當時的立法局通過，就可以馬上開工，但根據筆者們的記憶，在一九八〇年，電氣化鐵路改造與全線雙軌行車兩項工程同時展開，令工程的複雜程度提升，其中一個難度就是要沿線收地，並且進行平整和月台改造，令這段全長只有三



▲電氣化鐵路之前的旺角車站

作者供圖

十六公里的鐵路工程需要更長的工時。

在一九八一年，由九鐵訂購的首批電氣化車廂陸續由英國運抵本港，經過連串的試驗營運之後，九鐵第一期電氣化於一九八二年五月六日正式通車，讓香港的鐵路服務正式進入電氣化時代。



如是我見

海峽兩岸及港澳文學近七十年來的發展，雖然因地域不同而各有異趣，就現實主義創作方面，可以怎樣去理解？

近日在廈門舉行的「光耀海絲，情滿中華」海峽兩岸暨港澳文學研討會，吸引了約七十位來自北京、安徽、長春、山東、福建、廈門、金門、台灣及香港的作家、學者、評論家等，筆者有幸加入由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率領的代表團，夥同江揚、羅光萍、禾素和郭艷媚出席這次研討會。

兩天的研討活動，各位作家就現實主義創作與時代特徵，及海峽兩岸暨港澳文學的同質性展開熱烈討論，大家都作了精彩的發言分享。安徽省文聯副主席許輝說，每個時代都有其現實主義創作，分別反映在題材、內容和創作手法上，他以《莊子》為例，認為它整體具有理想型的文學風格，但它的某些篇章，卻具有情節性很強的故事，有着樸素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潘耀明歸納出香港作為華文文學視窗的各點特徵，讓與會者多了解香港文化之淵源和發展；香港這嬌小之地，是內地通向世界之橋，它擔當了文學交匯和文化的橋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是兩岸作家的中轉站，潘耀明率先整理了華文作家文庫，金庸先生曾支持他

成立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並親自題字。

台灣淡江大學的林黛嫻說為何台灣很多作家寫個人的小情小愛，其實創作者正是從個人生活狀態出發，描繪大時代的藍圖。

關於海峽兩岸及港澳文學的同質性之話題，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副主任李朝全綜述中華文學，乃同根同源，同文同義，而中華文化博采眾議、開放包容，我們皆有相同的文化觀，宜互補互促，互利互惠。廈門市作家協會主席林丹姪從女性文學的角度，論述文化記憶與文學再現，海峽兩岸及港澳的女性作家在表達方式相似，因文化情感是相連的，相互影響的。曾獲魯迅文學獎的作家張楚，簡述個人的閱讀史，發現原來多數同齡人的青春期都在閱讀三毛和金庸的作品，這是閱讀的同質性，他結語引述文化像水、像空氣，要流動，通過交流，才有活力。

會後，大家參觀了詩人蔡其矯故居紀念館、陳嘉庚紀念館、翔安澳頭文創村等，在泉州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見到這座文化古城曾經的各項經濟貿易、文化交流，鄭和下西洋的龐大船隊、鄭成功的各種船模、泉州灣的沉船出土，各種檀香、玳瑁、朱砂、貝殼等文物展品，看到我國古代悠長的海洋文化，以及中國人怎樣開闢海上絲綢之路，在廈門的各種中西文明對話故事，印象難忘。